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孙大雨评传

黄健 雷水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孙大雨评传

黄健 雷水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大雨评传 / 黄健, 雷水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161 - 0637 - 2

I. ①孙… II. ①黄…②雷… III. ①孙大雨 (1905—1997) —评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8292 号

孙大雨评传 黄健 雷水莲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思梵·星尚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0843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学勤 陈伯海 陈桥驿 高丙中
董乃斌 董楚平 葛剑雄

主 编 王建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华 叶 岗 朱志勇 寿永明
李生校 张炎兴 周一农 费君清
高利华 梁 涌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潘承玉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09JDYW01ZD)成果丛书

课题负责人(主编)

王建华 刘家思

课题组主要成员(副主编)

朱文斌 李先国 吕晓英 陈改玲 周桂华
钟小安 范志强 黄 健 傅红英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

序

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丛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课题编号 09JDYW01ZD）成果。

在世纪之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了浙江省不仅要建成经济强省，而且要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决策，大大地推进了浙江文化的研究，也激活后浓化了浙江的学术空气。社会发展必然推动文化的进步，但文化的精进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联性，自然要求浙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全面进步后尤其要重视建设。多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不仅是浙江省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也是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然而，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抓手，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人。因为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人主导的。因此，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主体的人所创造和彰显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和内在品格，为今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申报了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2009 年获得了立项资助。

从全省范围讲，浙江（越）文化研究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到 20 世纪末期揭幕，至今已经着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浙江（越）文化的史论研究；二是浙江（越）文化名人传记的研究、撰写。前者以宏观的理论探讨见长，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后者是从文化主体的个体出发来进行微观的透视，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主体



状态。这两种视角构建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浙江（越）文化研究的基础。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前几年组织力量重点研究了重大课题“越文化通论”等一系列课题，推出了一批成果，就是立足于史论，旨在为今后的越文化研究奠定基础的。然而，越文化研究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一是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历史走向现代，要服务于当代，启示将来，因此开展现代越文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二是文化不只是抽象的、概括的、普遍意义的，也是具体的、鲜活的、个性化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将理论的概括融入到鲜活的个体和具体的形态中去，另一方面又要从个体中把握其普遍的意蕴指向，同时还必须把握古往今来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超越的情形。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与基本面貌。一种先进的文化姿态总是既不会忘却历史，又能着眼于现实，放眼于未来；而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则不是着眼于传统，而是立足于现代。从本质上说，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把握内在精神的现代基质，探寻现实人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向。所以，文化研究必须具有三种眼光：过去——现在——将来；必须抓住三个基点：人——时代特征——自然环境；必须把握三种内涵：传统——现代——未来。而一种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现代的情形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把握现代的蜕变，是推进文化研究由注重历史走向着眼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

越中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在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越中诞生了蔡东藩（1877—1945）、刘大白（1880—1932）、鲁迅（1881—1936）、许寿裳（1883—1948）、周作人（1885—1867）、夏丏尊（1886—1946）、孙伏园（1894—1966）、胡愈之（1896—1986）、许钦文（1897—1984）、谷剑尘（1897—1976）、孙福熙（1898—1962）、章锡琛（1889—1969）、魏金枝（1900—1972）、孙大雨（1905—1997）、姚蓬子（1905—1969）、孙席珍（1906—1984）、吴似鸿（1907—1988）、陶亢德（1908—1983）、柯灵（1909—2000）、徐懋庸（1910—1977）、陈梦家（1911—1966）、金近（1915—1989）、谷斯范（1916—1999）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他们有的是现代文学大师，有的是“五四”白话新诗文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有



的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的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有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有的是白马湖派的代表人物，有的是湖畔诗社的重要诗人，有的是著名的戏剧家，有的是左翼文学的著名作家，有的是鲁迅杂文的继承人，有的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有的是近现代通俗演义小说重要的开创者……他们浸润着越文化的血脉，又创造了鲜活的现代越文化成果，显现了越文化的现代形态与内在特征，是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的活的文化标本，反映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越地人民的精神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文化成就。

因为以往的研究关注历史的比较多，而关注现代和当代比较少；关注文化精英和高层的较多，关注大众形态和普通性的很少，所以，除鲁迅和周作人之外，学术界对上述越中作家重视不够，大都没有被纳入到学术界系统研究的视野之中。而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发掘其精神资源，关注其现代文化成就的尤其少，审视其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显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在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由封建走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流变和思想引领的生动状态更疏于探究。因此，开展越中现代知名作家系列研究，是对浙江（越）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深化和拓展，意义重大。一、展示浙江文化的现代成就，展现浙江文化的先进性，弘扬浙江文化的现代精神，为正确认识从晚清到现代浙江（越）文化的历史特征提供一个切入口，为浙江（越）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思想启示；二、开拓浙江（越）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建构历史形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现代越文化研究的完整研究体系，推动浙江（越）文化的全面研究，推进浙江省文化工程的研究进程，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途径；三、为正确认识近代知识分子如何转变为现代文化精英提供一种理论指导，为现代史书写提供参考；四、填补上述作家没有整体的空白，深化和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文学欣赏提供指导和启示；五、为 人物研究和评传写作提供一种学术借鉴与参照；六、镜照世俗社会，启示现实人生，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准备分期分批地对上述知名作家展开研究。最初的设想是 2005 年提出的，2007 年着手准备，2008 年开始启动，2009 年开始



了全面的实质性研究，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目前选取了学术界关注比较少，整体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是还没有做过整体研究的10位作家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组成了《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系列研究》重大课题。这些作家是蔡东藩、刘大白、许寿裳、夏丏尊、孙伏园、胡愈之、魏金枝、孙大雨、徐懋庸、陈梦家等。我们从校内外选取了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实力的教师作为课题组成员，采取统一规划、目标一致、分项包干、责任自负的方式，展开研究。我们的想法是，这一批作家研究完成后，重新申报项目对第二批、第三批作家进行研究。至于为何没有将鲁迅、周作人两位大师列入第一批研究对象，是因为学术界对他们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很多，就是从浙江（越）文化视角去研究他们的成果也不少，这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越中现代著名作家的研究，发掘浙江（越）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如何将时代要求内化文化精进者的主体追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的深层原因，从而把握浙江（越）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精神脉络，找到浙江（越）文化的现代精神底蕴，构建越地现代人类学的理想图景。其特点在于：一、着眼于从近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抓住人这个主体，以系列研究来审视浙江（越）文化从封建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演变轨迹，打破以往研究中宏观宽泛的研究态势，改变割裂式的个别研究，既呈现浙江（越）文化的个体活性，又彰显浙江（越）文化的历史形态，避免以偏概全、人为设定的局限与不足；二、文化既是一种历史形态，又是一种现实形态，还有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形态，但文化研究始终是为现实形态的建构服务的，要着眼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打破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惯性思维模式，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转型的动态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整体研究，揭示社会的剧变对个体人生的影响，通过全面把握社会转型中不同个体的生命旅程、思想性格、人生业绩和创作成就，来把握浙江（越）文化的现代形态，改变以往以静态的文本解读和阐释的简单化方式，凸显文化的立体感和整体性；三、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构成要素，文化灌注在文学之中。因此，从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发展历程中来把握他们的文学创作，审视它们在现代浙江（越）文化建构中应有的文化、艺术和思想价值，



把握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彰显浙江（越）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力，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里，个体与整体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就成了我们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并重视将这些作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场域中。

在研究中，我们强调融社会批评与主体剖析于一体，理清各个研究对象的生命旅程和思想发展脉络，突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将事业（仕途）、爱情和交游三线交织，全面地展现其悲喜沉浮的人生，揭示其人生和创作取向的主客体成因，挖掘越文化的血脉渊源，立体地展现其真实形象，彰显其现代的精神特征和越文化的现代品格。同时，我们又注重分析和把握他们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认识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的研究，既注重文化个体活性，又注重理论概括；既注重历史传统的把握，又注重对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并以社会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为指导，突出原初性研究特征，挖掘越文化渊源；且以文本研读、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为路径，立足于社会转型的背景来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透视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以及价值追求，进而彰显浙江（越）越文化的现代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予以比较客观的评价；注重对现有研究文献和传记资料的甄别与辨正，剔除以往研究中的错漏与偏失，力求还研究对象一种本来面目；注重从特定时空背景中去审视研究对象主体人生的独特状态，力求对其人生和思想历程作出比较科学而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一方面高度重视搜集越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以及各研究对象散落的文学作品、文献资料 and 生平事迹，把准其精血气；另一方面又重视对研究对象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考察，重视访问其后人及其友人的后代，重视与相关的研究专家交流，以完善研究工作。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再三讨论了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有审定了各专著的写作纲要，以使整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保持面貌的基本一致，而又各具个性和特色。在这套成果丛书出版之前，我们也随机性地选择部分书稿予以审阅，每部书稿都经过了三、四次的修改。然而，由于研究对



象几乎都是博古通今、中西交融的鲜活的文化个体，牵涉的学科领域很广，触及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很深，文化内涵很丰富，对研究者的素养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赋予了研究工作本身的较大难度；加上课题组成员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有的还担负了繁重的管理工作，精力不够集中，时间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水平有限，并且对人物评传的撰写缺乏经验，因此，研究工作难免存在一些着粗疏和不足，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同时，由于课题组成员从事研究的经验和实力本身存在差异，因此，虽然我们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大都十分认真和负责，但实际上这套丛书的质量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是我们尤其感到不安并又要恳请读者谅解的。我们必须告白的是，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的工作。

在研究进入尾声，成果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课题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感谢全体课题组成员几年来的密切协作与艰苦工作，使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领导部门以及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才由设想变为了现实，这套成果丛书才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宫京蕾编辑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此外，对一直以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予热情帮助和关心的许许多多好心人，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课题负责人：王建华 刘家恩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	(1)
第二章 幸运的童年	(11)
第三章 新文化的影响	(15)
第四章 清华园的诗人梦	(22)
第五章 “爱”与“美”的理想	(33)
第六章 海外求学 探索现代诗	(45)
第七章 “新月”的韵律	(64)
第八章 大学执教 学者生涯	(82)
第九章 在青岛的日子	(90)
第十章 南下杭州 任教浙大	(103)
第十一章 再上北京 翻译莎剧	(111)
第十二章 辗转沪港渝 参与社会活动	(123)
第十三章 投身民主运动 争取自由解放	(136)
第十四章 感知新时代 人生转折点	(146)
第十五章 心觉不公 祸起萧墙	(152)
第十六章 坚持学术 坚守理想	(160)
第十七章 “反右”风暴 中箭落马	(168)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惨遭迫害 再陷囚牢	(195)
第十九章 劫后余生 重回高校	(211)
第二十章 沟通中西 传播文化	(232)
尾声：消逝的“月光”	(268)
附录	(277)
后记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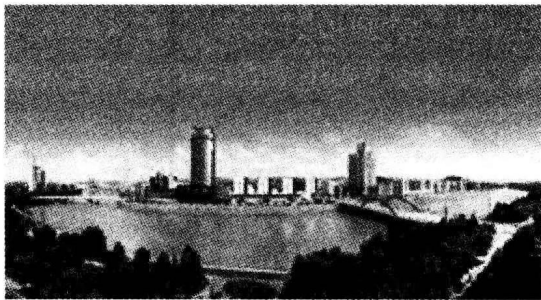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引 子

一条蜿蜒的钱塘江，发源于安徽省黄山，流经安徽到浙江后，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块既有密切联系，又保留各自不同风俗的区域。^① 位于会稽山西麓的浙江诸暨，就属于“浙东”区域。

诸暨是古越民族聚居地之一，也是越王勾践图谋复国之地和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故里。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始设诸暨县，属会稽郡，历代未废。诸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据历史记载，远在新石器时代，其境内的次坞、东白湖、陈宅、璜山和浣东等地，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吴越争霸时，越王曾先后在诸暨境内的埤中、大部、勾乘等地建都，可以说，诸暨也是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绍兴府志·地理志》曰：诸暨“周为越允常之都。《路史》：夏后氏后。诸暨有诸山暨浦，允常之都。春秋时句无地，或曰夫概王之故邑，先名上诸暨，亦曰句吴。《国语》：句践之地，南至句无，韦昭解：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水经注》：诸暨县，古越地也，夫概王之故邑，先名上诸暨，亦曰句吴矣。寇仲温《诸暨县记》：诸暨，楮概也，吴王阖闾弟夫概所封之地”。

^① “浙东”和“浙西”合称“两浙”，为历史地理概念，指的是以钱塘江为界，将现在的浙江省和江苏、上海的部分地区分为“两浙”地区。一般而言，钱塘江以南的地区，即今天的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等地区，通称“浙东”地区；而钱塘江以北的地区，即今天的杭州、湖州、嘉兴、江苏南部（含上海）的部分地区，亦即环太湖流域，通称“浙西”地区。“两浙”的来源最早见于唐代乾元元年（758 年）设置的“两浙道”，北宋至道三年（997 年）置“两浙路”，元代正式建制“两浙省”。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讲，“两浙”属吴越文化区域。因此，以历史的维度而言，“两浙”文化亦可以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吴越文化，但主要是指设置“两浙道”之后的吴越文化。以地域的维度而言，由于主要是相对北方文化来说，“两浙”文化属于江南文化范畴。大致比较而言，“浙东”属越文化区域，“浙西”属吴文化区域。



图为浙江省诸暨市

孙大雨的祖籍为浙江诸暨。据他后来回忆说，在六朝五胡乱华时期，全家为了避难，他远祖从山东乐安郡迁徙到诸暨，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可算是“老乡”^①。据孙氏家谱记载，孙家乃为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之后，又与司马氏合家。在浙江诸暨，孙氏算得上是大族，在当地颇有名望。

孙家属于“南迁”的家族。^② 在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的“南迁”对江南区域的发展，特别是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据历史记载，西晋的“永嘉之乱”，大批的中原士人（族）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潮，从而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汇，江南文化特色开始形成。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广袤的南方区域，尤其是江南，往往是北方士人（族）迁徙的首选之地。除“永嘉之乱”外，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大批北方士人（族）迁徙江南，不断地给当时还处于边缘地域的江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形成南北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之势，进而使江南成为当时的又一个文化中心。历史学家指出，江南在“永嘉之乱”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北方移民”，如南

①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邪人（今山东临沂），后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② 一般来说，广义的江南主要是针对北方区域而言，多半指长江以南广袤的区域，而狭义的江南则主要是指历史地理范畴内的长江三角洲区域，除了“两浙”区域之外，还包括扬州、南京（建康、金陵）。“永嘉之乱”后，北方许多士族大批迁徙江南区域。《晋书·王导传》记载：“中州士女避乱江东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人家均携宗族、家眷、宾客及同里同乡，纷纷逃往江南，据史书记载，随一户南迁的往往有数千家之多，人口达数万之多。



朝的一些杰出人才“多产于是区”^①。可以说，历史的劫难，无意之中推动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与定型。宗白华曾经指出，魏晋六朝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在受到来自北方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之后，江南文化的诗性品格得以进一步的激活和铸塑。南宋定都杭州之后，这种情形则更是得到了强化，如同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既是吴越地区三次加速发展的机遇，也是吴越地区对中华文明的三次拯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最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③历史上三次重大的南迁，对于江南区域而言，特别是对以“两浙”为主的江南区域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大促进了该区域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大批的文人学士纷纷南下，如北宋理学家的南迁，就促进了南宋的理学发展，后来更是催生了“浙东学派”的形成。南迁的北方文学家如李清照、辛弃疾等，山水画家李唐等，均在“两浙”区域的江南之地居住、生活，对促进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文化审美形态上来看，历史劫难使江南文化诗性品格得以不断地纯化，使之能够以更加明丽的物象表现，以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中国文化固有的诗性精神推向了唯美的极致，使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过于强调“教化”、“载道”一类政治伦理规范的束缚，呈现出抒发自我情感，追求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发展态势。所谓寄情于山水，让心的世界在极具隐逸色彩的江南乡村，在江南的丘山谿壑、村居野炊中，找到弥补心灵缺憾的审美愉悦，追求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推崇禅宗教义，使之与老庄哲学相结合，亲近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在审美认知中获得美学灵感，力求摆脱世俗琐事的纠缠，获得“宁静致远”的人生格调，达到心灵超然的境界……这一切都成为南宋及其之后的江南文化审美意识发展的主流形态。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②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③ 董楚平：《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处在江南区域南翼的“两浙”地区，其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两浙”文化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等特点。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圈内，相对北方中原中心地带而言，地处边缘的“两浙”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因此，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方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方面，它都需要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接收来自中心地域文化的辐射，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两浙”地区发展史表明，东汉以后，“两浙”地区接受中心区域的各种辐射就不断地得到加强。隋唐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即是唐宋之后整个江南之地繁荣盛况的写照。“两浙”地域文化与中心区域文化的每一次碰撞与整合，非但没有被同化或解体，相反，而是不断地增强自身的向心力和调适力，不断增殖，不断发展。毋庸置疑，“两浙”地域文化这种比中心文化更为鲜明的生存忧患和开放进取的精神特质，对其文化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书·地理志》中称：“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高帝纪》又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这些习性的生成和变化发展，与“两浙”文化的刚柔相兼济、沉郁而激越、自由而活跃，耻为人后，精明强干，开拓进取等都有着密切关系。地域文化在给予该区域人们的精神关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是支撑和稳定该区域人们的心理和整合区域社会的精神支柱，也是该区域人民创造自身历史、丰富整体文化的精神动力。蔡元培在《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中这样赞美道：“经论云雷，实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义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翹。……儒林大师，余姚肇祖。千祀不祧，授经图谱。新昌朴学，翼左程朱。良知证人，大启堂庑。文苑之英，盛哉典武。”^①从文化生成上来看，这种不断演化和积淀而呈开放进取的“两浙”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影响了该地域人们的

^①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思想观念、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因此，一般迁徙到江南、“两浙”区域的“南迁”士人（族），对文化的传承都非常看重。

作为“南迁”士人（族）的后代，孙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清朝末年，孙大雨的曾祖父孙鄂生因家庭生活困难，便从诸暨乡下来到上海谋生。到了祖父孙恕斋手中，先是做一些小生意，有了些资本后，便转为经营沙船业^①。经祖父的艰苦创业，孙家经营的沙船业务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为此祖父还专门聘请了川沙王港乡的秀才米兰亭负责沙船业的管理工作。不过，经营沙船业，竞争十分激烈，船只的日常维护和运输，开销非常大，时常会有船只因故障不能开运，甚至有时还会有沉船的消息传来。有一次，孙家经营的沙船就发生了严重的船只事故，导致祖父孙恕斋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后才被救起，可谓是大伤元气，孙家经营的沙船业也由此开始衰落。后来，全家迁居到上海，落户在南市^②，在靠近城隍庙前昼锦牌坊安家^③，并在四马路开了一间名叫“振昌盛”的百货铺，主要经营各类丝线，特别是扎辫子用的丝线。因为清朝时期的人背后都扎有一根长长的辫子，扎辫子的丝线销路非常好，可谓生意兴隆。当时，孙家每月可从店中支取 200 元银洋用于日常开销，可谓是小康人家。

鉴于做贸易和经营沙船业都吃了没有文化亏的教训，孙大雨的祖父非常注重儿子的培养。早在经营沙船业时，他聘请秀才米兰亭一边负责沙船业的管理工作，一边也让他兼任儿子的私塾先生，教儿子识字，学文化。孙大雨父亲孙廷翰，字问清，小时聪明伶俐，学习也很用功，经努力学习，后成为清代末科翰林。^④ 不过，考取翰林后，他一生并未做官，而是在南市城隍庙附近建造了一幢二层前后五进的房

① 据史书记载，清道光六年（1826 年）重开海运漕粮，决定先交由江苏试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地粮船均至上海（当时上海只是江苏松江府下的一个县）交兑，沙船业便由此再度兴旺起来。

② 南市原为上海市的一个城区，现于 2000 年撤销建制，分别并入黄浦区和浦东新区。

③ 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刘屿、刘琛在上海县衙西边立“应奎”、“清显”和“昼锦”三牌坊，人称“三牌楼坊”（俗称牌楼），沿路多为商铺和住宅。

④ 翰林在古代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唐代开始设立翰林院，唐玄宗后逐渐演变为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在翰林院任职的人称为翰林学士。明代永乐朝之后，翰林院被内阁代替，逐步远离政治，成为撰修书史和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机构，但地位也很重要，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也多由此而出。在清代，翰林的地位并无太大的变化，但影响力则不如以前。